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发展中的问题应该也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更好更快的发展加以解决——

以更大力度改革创新加快绿色转型

●刘世锦

核心观点

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根本上靠的是全面系统的“换技术”。新技术的研发需要投资,进而带动增长,推动创新,这是发生变化的深层次逻辑。创新及其带动的低碳绿色产业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是处理各种矛盾、理顺复杂关系的关键所在。

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并不仅仅是坐而论道,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数以万亿计的研发和产业投资已经投入,如果长期目标动摇或后退甚至放弃,所涉及的不仅是理念和价值观问题,更是巨大的利益问题。

双碳目标拉动创新和新增长动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近四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碳达峰与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使中国发生了超乎预期的变化。回溯四年前,提及“碳中和”,鲜有人能阐述其内涵。时至今日,若仍对碳中和陌生,则无疑已落伍,已出现了大量专家或自称为“碳中和专家”的人士。

尤为重要,中国不仅在口头上倡导,更在行动上全力以赴。一系列创新驱动的低碳绿色产业迅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造、绿色投资和市场发展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过去几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多年来,中国在风、光、水电、生物质发电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在可再生能源的关键零部件生产领域,中国全

球市场占有率普遍超过70%。尤为突出的是“新三样”,去年其出口总额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这在三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更为关键的是人们观念上的深刻转变。过去的长时间内,人们把环保、减碳与增长看成相互掣肘甚至抵消的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现在已经转变为相互促进和共赢的关系。

其中的关键变量是创新。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根本上靠的是全面系统的“换技术”。新技术的研发需要投资,进而带动增长,推动创新,这是发生变化的深层次逻辑。创新及其带动的低碳绿色产业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是处理各种矛盾、理顺复杂关系的关键所在。

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分别是内生性绿色技术和修补性治理技术。修补性治理技术,是指在维持已有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所采取的补救办法,特征是“先排放、后治理”。

而内生性绿色技术,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可大幅度减少碳排放量。例如,每千瓦时发电,碳排放量仅为1000克,光伏为30克,风能为10克;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风能发电,碳排放量分

别减少970克或990克,也就是用3%或1%的碳排放量发出同样数量的电,这就是内生的绿色技术。

目前,传统燃煤发电技术体系下,前期采用节煤技术,以后采用碳捕捉、碳封存等技术,都属于修补性治理技术,成本难以降低。光伏、风电等碳排放很少,属于内生性绿色技术,降碳成本很低,接近于零。

绿色转型初期,光伏、风电等生产成本高、降碳成本低,综合成本较高,形成“绿色溢价”。传统燃煤发电生产成本低,降碳成本高,综合成本具有优势。

绿色技术创新展开并加速后,出现超出预期的新格局。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太阳能光伏的成本下降了近90%,陆上风电降低了近70%,海上风电下降近60%。目前,风光发电成本已经接近或低于燃煤发电,加上降碳成本,已具明显竞争优势。

内生性低碳绿色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技术进步速度快,潜力大,规模效应带动成本降幅明显,产业链和其他配套条件较好,有较强的韧性和抗冲击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创新主体,创新活力强,反应速度快。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各板块出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

过去几年我国在绿色转型中出现

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变化是,由以往固守原有技术和生产体系的节能减排,转向更多依靠全面拓展新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创新,或者说,由修补性治理技术转向内生性绿色技术,由“先排放、后治理”转向低碳绿色的技术和生产体系。

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要重视识别并区分修补性治理技术和内生性绿色技术,防止“假转型”;更多地支持内生性绿色技术,有利于实质性促进创新,防控风险,降低成本,加快绿色转型进程。

坚持双碳目标稳定长期预期不动摇

去年12月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次提出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目标。今年是全球大选年,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有可能带来冲击性和一定的不确定性。目标决定预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目标的确定性更为关键。如果既定的目标有所摇摆,后退,很多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停下来,甚至前功尽弃。

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并不仅仅是坐而论道,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数以万亿计的研发和产业投资已经投入,如果长期目标动摇或后退甚至放弃,所涉及的不仅是理念和价值观问题,更是巨大的利益问题。

目标动摇或者后退,是相当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前进还是后退甚至陷入危机的关键。谈论气候变化和碳中和,风平浪静时容易,遇到困难和风险挑战时,才真正考验人们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战略定力,动摇和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产能增长两倍、能效提高一倍的目标,有实现可能

性。今年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零售和批发渗透率均超过50%,今年7月,月度渗透率超过了50%。

实际上,政府有关部门提出2035年实现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50%的目标,现在提前11年实现了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否可以由相关部门设定的目标过于保守呢?实则不然。当时他们提出该目标时,大家感觉这一目标有一定的超前性。事实上,投身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企业家,在起步之初,也难以想象会达到现在的发展水准。一旦进入创新轨道,很多发展是可能超出预期的。

中国应当积极响应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目标,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指标应该相应提升,新技术、新产业对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替代速度应相应加快。这将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增加研发投入。

当前,随着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大量产能投入后,急需迅速扩充规模以实现规模经济,进而为研发提供更多投资。这个领域的企业无法等待十年、二十年再进行扩张。产业发展到这个程度,必须加速,否则众多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难以继。我们可以预期,新能源汽车乃至整个绿色低碳产业的增速,有可能超过原先的设想,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

全面深化改革和更好更快创新发展

毋庸讳言,新能源发展中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有些严峻而紧迫。如新能源供给不稳定、消纳和外送受限、分布式能源上网难、隔墙售电难、市场“内卷”和价格下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等,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仍然有效,发展中的

问题应该也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更好更快的发展加以解决,慢发展和不发展才是更大的问题。

关于市场“卷”的问题,国际上有人认为是中国新能源产业严重过剩。如果把“卷”理解为产能过剩,其实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国际上有些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又认为中国有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首先要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同时要回答新能源产业为什么能在中国卷起来。实际上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是因为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产业配套条件好、工程化能力强,尤其是有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活力等。中国企业至少在新领域没有输下,而是在奋力竞争,并且走到前列。也就是说,国际上必须承认中国的市场竞争优势是一个客观事实。

事实上,大量进入、竞争淘汰、优势企业脱颖而出,市场份额集中,是市场竞争的正常过程,也是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必经过程。需要防止或避免政府不当行政干预和某些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对市场秩序的扰乱。

政府应更好地发挥作用,坚持双碳目标不动摇,适时推出各级政府减碳量化目标;系统搜集并及时发布新能源产业投资、生产、消费等方面的信息,帮助投资者、生产者、消费者做出正确决策。

应深入学习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止扭曲要素价格的“筑底”竞争,纠正各种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有利于国内国际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

(据《北京日报》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唐亚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指出:“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开启了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职尽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内蕴着革命的逻辑、现代化的逻辑、人民民主的逻辑以及国家治理的逻辑,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

革命的逻辑

鸦片战争后,曾创造了灿烂中华文明并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无数仁人志士开展了救国救民的艰难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难以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难以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发展局面。

在追求国家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通过组建具有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政党,并通过政党的引领与治理,才有可能实现近代中国的根本性变革、国家的独立统一和人民的伟大解放之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根据近代中国的国情,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对象、任务、方式和路线等,承担起反帝反封建与实现国家独立统一的历史使命。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着重理论、组织上、队伍上、领导上等各方面的不成熟,面对着近代中国分化的阶级基础、发展不平衡状况以及国内外统治集团联合镇压等复杂局面,需要根据不同阶段革命任务的不断变化,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有鉴于此,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案》,提出了“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

主义大同盟”。“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等统一战线战略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近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任务的需要而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自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战略在其先后创建的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全新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等多个革命政权形态中得到落实和体现,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团体在不同革命时期政治联盟的形成。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通过协商建国的方式,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进一步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在宪法层面确立了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内蕴着革命的逻辑、现代化的逻辑、人民民主的逻辑以及国家治理的逻辑,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

现代化的逻辑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历史文化与社会基础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各有千秋,这就导致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利用其先发优势,占据了现代化发展的先机,并通过其优势地位,强占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各种资源,甚至利用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经济规则体系,通过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垄断性地位,以公开或者隐蔽的方式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接受各种超额利润的压榨与盘剥,并难以获得公平稳定持续发展的机会。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种夹缝中艰难起步的。

面对着旧中国工业化基础极其薄弱、城市化率极其低下、国家四分五裂、人民生活水平极其落后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等情况,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力量和作用,创造了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中华儿女齐心协力的团

结局面,为实现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强大人心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凝聚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和优势,推动统一战线在各层级各地方、各行业各领域生根开花结果;三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把多党合作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起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人民民主的逻辑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除了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外,还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国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大形态的有机结合,是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民主的集中体现,而政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的有效运作形态,也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协商民主的要义在于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相同的发展目标,多方协商主体通过平等参与、议事协商、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方式,将协商融入于决策之前与决策之中,由此形成最大共识和团结合力,为共同体的一致性行动和有效性发展奠定基础。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协商民主实践中,不仅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而且通过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人民民主组织形式,将协商民主落实到各层级各领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家治理的逻辑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政治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政党、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三者的有机统一关系。因为现代政党已成为现代政治运转的中枢,是将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进行有机融合并成一体的一体化力量,故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既可以通过其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体现,又可以通过其共识性目标和一致性行动,将各方力量有机凝聚在一起而体现,还可以通过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多层次内容体系、协商平台体系、协商机制体系等,实现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估的科学化民主化责任化绩效化等目标而体现。

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形成包括国家权力机构体系分工协作、央地部门体系分工联动、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主体分工配合的治理体系与治理格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在于构建相向而行的目标体系、协调一致的行动体系、整体高效的绩效体系,并通过发挥各层级各领域各机构各部门代表力量的作用,将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生动有效的治理实践与持续提升的发展绩效,进而全面展现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

(据《光明日报》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切莫陷入事务主义

●蔡礼强

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繁重,党员干部身上的担子都不轻。越是面对繁重的工作,越要警惕陷入事务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的。”事务主义既会影响党员干部成长成才,也会贻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员干部要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就要防止陷入事务主义。

对于事务主义,我们党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庸俗的事务主义者”进行批评,指出“他们尊重经验,缺乏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陷入事务主义的人,往往眼里只有具体事务,不愿学习理论,不愿深入思考,不愿主动谋划,缺乏长远目标和大局观念;工作中分不清主次、抓不住重点,满足于得过且过的被动应付状态,机械做事,不能创造性开展工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却忙而无功,没有真正干成几件事。如果一个地区或部门的主要领导陷入事务主义,不善于把方向、谋全局、抓大事,只会忙忙碌碌机械做事,那就贻误地区和部门的发展。

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通过理论学习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克服事务主义的良方。陷入事务主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机械做事,忙忙碌碌、疲于应付,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理论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揭示,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工作才能有方向、有目标、有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领会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突出重点的辩证思维等,就能有效克服事务主义的盲目机械、杂乱无章。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只有理论强才能方向明、思路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宝本领学到手,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要防止陷入事务主义,还要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是领导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述肖劲光同志的故事。肖劲光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命担任海军司令员,虽然他从没接触过海军,自己还是个“旱鸭子”,但是通过边干边学,使我国海军从无到有、迅速壮大,从而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要求党员干部不能满足于被动完成工作、交差了事,而是善于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思考、学习提升,总结思考的重点在于把握规律,从理论上深化认识。只有把现象问题上升到本质层面、把局部问题上升到全局高度,把当前工作放在长远发展中去思考和总结,才能切实把工作的内在规律搞明白,从理论上把问题想清楚。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还要通过读书学习增加知识储备、提升理论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一些领导干部对于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针对工作中出现的事务主义现象,党中央开出的药方就是读书。把干中学和学中干结合起来,就能避免因陷入事务主义而搞得手忙脚乱、徒劳无功,不断增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能力和水平。

(据《人民日报》)

